

霞浦科仪本《下部赞》诗文辨异

林悟殊

新近由林銮先生主导的霞浦明教遗迹田野调查，发现当地民间法师所保存的某些科仪本，间杂摩尼教词章，若干《下部赞》诗文更是赫然可见。是次调查成果，为揭示摩尼教在华的归宿，追踪佚失的摩尼教、明教经典做出重大贡献。本文拟就该等抄本中所采录《下部赞》诗文，与敦煌发见的写本作比较，辨其异同，释其差异产生之原因，冀有助于解开该等科仪本形成之谜。

关键词：下部赞 科仪本 明教 霞浦 敦煌

作者：林悟殊，1943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下部赞》（S. 2659）写卷，与京藏摩尼教经（宇56 / 北敦00256，以下简称《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S. 3969、P. 3884，以下简称《仪略》）同为20世纪初敦煌出洞的唐代汉文摩尼教写经。摩尼教华化为明教后，学界虽有发现《下部赞》传播于明教的痕迹，^①但惜无确凿证据。新近由林銮先生主导的霞浦明教遗迹田野调查，发现当地民间法师所保存的某些科仪本，间杂摩尼教词章，为揭示摩尼教在华的归宿，追踪佚失的摩尼教经典做出重大贡献。其间，若干《下部赞》诗文更是赫然可见。本文拟就该等科仪本所见《下部赞》诗文，与敦煌发见的写卷略作比较，考察其间之异同，辨释造成差异的原因，冀有助于解开该等科仪本形成之谜。

一、霞浦科仪本所见《下部赞》诗文

2010年8月，蒙林銮先生嘱其助手张凤女士传赐部分新见霞浦科册照片，笔者据此查得敦煌卷《下部赞》（以下简称“敦煌本”）的一些诗文，见于陈姓法师“存修”并题的《摩尼光佛》科册（以下简称“陈摩本”），还有其保藏的《兴福祖庆诞科》（以下简称“陈兴本”），^②另见于谢姓法师保有的《点灯七层科册》（以下简称“谢点本”）。现将彼等诗文完整可确认者，列组比较如下（为便于排版，各文本过录均改用简体字）：

①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宣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述及其时明教之人所念经文，有一首题为《日光偈》者，窃意或源于《下部赞》第360—362行的赞诗。另有晋江学者粘良图先生在当地摩尼教遗址草庵周遭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成形于明末清初的草庵诗签，表述风格与《下部赞》类似，而且包含《下部赞》一些常用术语；详见拙文《泉州晋江新发现摩尼教遗迹辨析》，刊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页754—767；修订本见拙著《中古夷教华化丛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20—39页。

② 霞浦发现的《兴福祖庆诞科》应不止一个文本，缘见于元文琪先生《福建霞浦摩尼教科仪典籍重大发现论证》一文（刊《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第168—180页）披露的某些文字未见于笔者所得照片。

第一组:

是故澄心礼称赞，除诸乱意真实言。承前不觉造诸愆，今_时悬_忤罪_销灭。(敦煌本行 11) ①

是故澄心礼称赞，除诸乱意真实言。承前不觉造诸愆，今_夜悬_忤罪_消(灭)。(陈摩本页 45)

是故登心礼称赞，除诸乱意真实言。承前不觉造诸愆，今_夜悬_忤罪_消灭。(陈摩本页 74—75)

第二组:

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璎珞。洗_我妙_性离尘埃，严_饰净_体令端正。(敦煌本行 30)

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璎珞，洒_除坛_界离尘埃，严_洁净_口令端正。(陈摩本页 32，又见页 44—45)

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璎珞，洒_除坛_界离尘埃，严_洁净_口令端正。(陈兴本页 5)

第三组:

大圣自是吉祥时，普曜我等诸明_性。妙色世闲无有比，神通变现复如是。(敦煌本行 42)

大圣自是吉祥时，普曜我等诸明_使，妙色世间无有比，神通变化复如是。(陈摩本页 29)

大圣自是吉祥时，普曜我等诸明_使，妙色世间无有比，神通变化复如是。(谢点本页 2)

大圣自是吉祥时，普_耀我等诸明_使。妙色世间无有比，神通变现_获如是。(陈兴本页 2)

第四组:

普愿_齐心登正路，速_获涅槃净国土。七厄四苦彼元无，是故名为常乐处。(敦煌本行 119)

普愿_灵魂登正路，速_脱涅槃净国土。七厄四苦彼元无，是故名为常乐处。(陈摩本页 45)

第五组:

又启日月光明宫，三世诸佛安置处，七及十二大_船(船)主，并余一切光明众。(敦煌本行 127)

又启日月光明_佛，三世诸佛安置处。七级十二大(般)主，并诸一切光明众。(陈摩本页 43)

第六组:

又启普遍忙_你尊，阎默惠明警觉日，从彼大明至此界，敷_杨正法救善子。(敦煌本行 135)

又启普遍摩_尼光，阎默惠明警觉日，从彼大明至此界，敷_扬正教救善子。(陈摩本页 43)

第七组:

复告冥空一切众，大力敬信尊神辈，及诸天界诸天子，护持清静正法者。(敦煌本行 140)

复告冥空一切众，大力敬信尊神辈，及诸天界诸天子，护持清静正法者。(陈摩本两度

① 本文所引敦煌本《下部赞》，均据笔者最新整理之释文加以简体化，见拙著《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434—466页。

出现, 见页 11 和页 44, 文字相同)

第八组:

一者无上光明王, 二者智惠善母佛, 三者常胜先意佛, 四者欢喜五明佛, 五者勤修乐明佛, 六者真实造相佛, 七者信心淨风佛, 八者忍辱日光佛, 九者直意卢舍那, 十者知恩夷数佛, 十一者齐心电光佛, 十二者惠明状严佛。身是三世法中王, 开杨一切秘事; 二宗三际性相义, 悉能显现无疑滞。(敦煌本行 169—172)

一者无上光明佛, 二者智惠善母佛, 三者常胜先意佛, 四者欢喜五明佛, 五者勤修乐明佛, 六者真实造相佛, 七者信心淨风佛, 八者忍辱日光佛, 九者直意舍那佛, 十者知恩夷数佛, 十一者齐心电光佛, 十二者状严惠明佛。自是三世法中王, 开扬一切秘事; 二宗三际性相义, 悉能显现无疑滞(陈摩本页 48—49)

第九组:

唯愿今时听我启, 降大慈悲护我等, 任巧方便自遮防, 务得安寧离冤敌。(敦煌本行 206)

惟愿今时听我启, 降大威神护我等, 任巧方便自遮防 务得安寧离冤敌。(陈摩本页 45—46)

唯愿今时听我启, 降大威神护我等, 任巧方便自遮防, 务得安寧离冤敌。(陈兴本页 5)

惟愿今时听我启, 降大威神护我等, 任巧方便自遮防, 无等安寧离冤敌。(谢点本页 1)

第十组:

香气□氤周世界, 纯一无杂性命海, 弥纶充遍无鄣碍, 圣众遊中香妙最。(敦煌本行 301)

香气氤氤周世界, 纯一无杂性命海, 迷纶充遍无障碍, 圣众游中香妙最。(陈摩本页 9)

香气氤氤周世界, 纯一无杂性命海, 弥伦充遍无障碍, 圣众游中香妙最。(陈摩本页 56)

第十一组:

彼界宝山亿千种, 香烟涌出百万般, 内外光明体清淨, 甘露充盈无边畔。(敦煌本行 303)

彼界宝山亿千众, 香烟涌出百万般, 内外光明体清淨, 甘露充盈无边畔。(陈摩本页 10)

彼界宝山亿千众, 香烟涌出百万般, 内外光明体清淨, 甘露充盈无边畔。(陈摩本页 57)

彼界宝山一切众, 香烟涌出百万般, 内外光明体清淨, 甘露充盈无边畔。(陈摩本页 69)

第十二组:

此偈你逾沙忏悔文。我今忏悔所, 是身口意业, 及贪嗔痴行, 乃至纵贼毒心, 诸根放逸; 或疑常住三宝并二大光明; 或损卢舍那身兼五明子; 于师僧父母、诸善知识起轻慢心, 更相毁谤; 于七施十戒、三印法门, 若不具修, 愿罪销灭!(敦煌本行 410—414)

忏悔玄文。我今忏悔所, 是身口意业, 及贪嗔痴, 或乃至从贼毒心, 诸根放逸; 或宜常住三宝并二大光明, 或损卢舍那身及五明子; 于僧师父母、诸善知识起轻慢心, 更相毁谤; 于七世十戒三印法门, 若不具修, 愿罪消灭。(陈摩本页 34)

二、霞浦本《下部赞》诗文与敦煌本同源

以上十二组仅限于笔者所能看到的照片, 也许未披露的照片还有。就上面十二组诗文, 其原

件的书写，霞浦版文字已去除了唐代的异体字，虽然也采用一些明清时期流行的异体字，但今人多能辨认。除异体字有别外，各版本一些不同字，如“销灭”和“消灭”，“普曜”和“普耀”，“弥纶”和“迷纶”、“弥伦”等，属于汉语的通假或别字，并无造成意思的变化。

更有，敦煌本个别字损缺不清，竟亦可在霞浦本得到参证。例见第十比较组，敦煌本第301行首句“香气□氲周世界”第三字，既往之录文，包括《大正藏》，均作“氛”。笔者细察敦煌写卷原件照片，该字乃在旁补入，字迹不清，但作为部首的外形“气”，清晰无疑；至于里面的笔划则依稀难辨，不过底端明显有一横划，故该字不可能复原为“氛”。照现存的字迹，结合诗句的语境，原字若非“氲”，则当为“氲”。“氲氲”，辞书释为“气盛貌”，“弥漫充满貌”，“沉郁貌”；“氲氲”，辞书作烟气、烟云弥漫貌解，均符合本处意境。该行诗句陈摩本两度出现，是字均作“氲”。是以，可据此确定敦煌卷之含糊字必作“氲”。

还有，敦煌写卷个别字句亦可参霞浦本勘误。例见第八组的“十二者惠明壮严佛”一句。按“惠明”作为明尊召来与暗魔战斗之明神，名字已见《残经》，因此状严无疑应为惠明佛的修饰语。瑞典学者翁拙瑞早就疑敦煌本此处有错。^① 陈摩本作“十二者状严惠明佛”，确认了敦煌本此句之误。

有些明显的差异，属于霞浦本书写过程的无心之错。如第一组的“是故澄心礼称赞”，陈摩本有一处，将“澄心”作“登心”；第九组第四句的“务得安寧离冤敌”，谢点本把“务得”作“无等”。甫一比较，即可看出系笔误，不至误导看官。

此外，有些字词完全不同，但究其意思并未引起实质性的差异，可能是源于唐代《下部赞》的不同版本。例见第九组，即《下部赞》第206行。该行在写卷中，隶属题为《叹诸护法明使文第二迭》（第197—208）之诗偈，其次句“降大慈悲护我等”，霞浦三个科册均把“大慈悲”写成“大威神”。这显非传抄笔误，缘“慈悲”和“威神”无论字形、发音和含义，都无近似之处。但在诗中，两者都可以解通。从意境看，面对冤敌的纠缠，请神降“大慈悲”或降“大威神”来救护，并无引起意思的变化。不过，从词语的配搭看，“降大威神”比“降大慈悲”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后者若改作“发大慈悲”似较贴体。不过，这一差异很可能出自唐代不同抄本，缘如此细微处，后世明教徒未必会顾及。

类似例子尚见第十一组，即《下部赞》第303行前两句“彼界宝山亿千种，香烟涌出百万般”。首句末字的“种”，在霞浦诸本中作“众”，两字发音近似但义不同。霞浦版的“宝山亿千众”当然很通，但从上下句看，“亿千种”与次句的“百万般”对仗则更工整。如此修辞上之微妙不同，未必就是霞浦本之所为，很可能亦是源于唐代之不同版本，写本在僧侣传抄时被有意无意修订。该诗在陈摩本出现三次，其第三次出现时把“亿千众”写作“一切众”，看来不过是无心之错。“一切”，是佛典极为频用的一个词语。^② 佛学辞书释之为“梵语 sarva，巴利语 sabba。乃总赅众物之词。音译作萨婆。”《下部赞》的表述深受佛门影响，万言写卷使用该词凡84次。而陈摩本科册约8400字，亦有15见，其间见于第七组敦煌本《下部赞》140行的“复告冥空一切众”一句，在陈摩本第89行、360行反复出现，也就是说，科册的制作者于“一切众”已耳熟能详。那么第478行写出现“彼界宝山一切众”，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上举诗句的比较不难看出，即便某些文字差异含义有别，但各诗文所表达的主体思想并无二致。因此，无论出自霞浦科册，抑或敦煌石窟，毫无疑问，都应源自唐代“道明所翻译”（敦煌本《下部赞》第417—418行）的同一摩尼教赞诗。

① P. Bryder,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 Bokförlaget Plus Ultra, 1985, p. 111.

② 检索2010年4月版CBETA电子佛典，该词出现凡486912次！

唐代摩尼教《下部赞》的一些完整诗文，竟出现在霞浦的科仪本上，证明了尽管摩尼教在会昌初元遭到残酷迫害，外来摩尼僧被杀害、驱逐殆尽，但其汉文经典，尤其是像《下部赞》这样佛味浓厚、表达通俗之宗教仪式用经，却仍长期在华夏民间传播。而福建、两浙在宋代以盛行明教著称，霞浦位于福建东北部，距著名的宋代道化摩尼寺崇寿宫所在地四明（宁波）仅 40 多公里，而离曾因明教之盛遭官方点名的温州则仅 90 公里，其地处明教流播区域，遗存《下部赞》诗文，自不为奇。

三、霞浦本所据《下部赞》版本

尽管上揭三个霞浦科册都出现《下部赞》诗文，但以陈摩本为多。敦煌本《下部赞》全卷 423 行，而今被采入该科册者，依次是第 11 行、第 30 行、第 42 行、第 119 行、第 127 行、第 135 行、第 140 行、第 169—172 行、第 206 行、第 301 行、第 303 行、第 410—414 行。就其所撮《下部赞》诗文于敦煌卷之分布，可推测科册制作者所接触的《下部赞》，应是比较完整者，而非残篇断简，否则不可能如此全卷式的遴选其诗文。不过，其所据者未必是唐写本，而应是被唐后明教徒修订过的新版。这从第六组首句的差异就可看出。敦煌本作“又启普遍忙你尊”，在陈摩本中，“忙你尊”作“摩尼光”。窃意此盖非科册制作者的修改。科册有关唱词见第 43 页：

- 340 又启普遍摩尼光，阎默惠明警觉日。
- 341 从彼大明至此界，敷扬正教救善子。
- 342 又启日月光明佛，三世诸佛安置处。
- 343 七级十二大般主，并诸一切光明众。
- 344 仰启摩尼大圣尊，愿降慈悲哀愍我。

前四句采自《下部赞》，倘其所读《下部赞》抄本作“又启普遍忙你尊”，那么为求称谓的统一，无非就是把“忙你尊”改为“摩尼尊”耳，而“摩尼尊”与该段唱词末行的“摩尼大圣尊”适好对应。而今科册作“摩尼光”，显然是照录所依据的抄本。在陈摩本科册中，“摩尼光”之谓，尚见于 508—509 行（科册第 64 页）：“五佛摩尼光，最后光明使，托化在王宫，示为太子。”第 558—559 行（科册第 70 页）：“伍佛记，诸经备。第一那罗延，苏路二，释迦三，夷数四，末号摩尼光。”

考“摩尼光”与“五佛”之联系，并不见于摩尼教在唐代中国之第一波传播，即自高宗武后到开元二十年（732）被玄宗敕禁这段时期。《仪略》撰于开元十九年（731），开篇《托化国主名号宗教》于教主诸名号阐释甚详，惟未涉及第五佛之谓，足以默证之。而到了第二波时期，即安史之乱后借回鹘势力卷土重来，于大历三年（768）请建寺至会昌二年（842）被残酷取缔，时教主被改称为“忙你”，自无“摩尼光”之号。改名原因很可能缘“摩尼”之谓，已被朝廷等同“邪见”，^①就如当年，波斯语 Mani 与疯子一词谐音而被影射那样。^②为避免尴尬，遂改用其它同音汉字来称教主。敦煌《下部赞》即为此一时期的产物。^③在整个写卷中，找不到“摩

① 《通典》卷四十载有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见（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103 页。

② 一位拜占廷注释家在一部反对一般异教徒的法典上，把摩尼教徒释为“波斯狂人的信徒”。Schol. 3 on Basilica 21. 1. 45 = Codex Iustinianus 1, 5, 21, 转引自 S. N. C. Lieu, “Polemics against Manichaeism as a Subversive Cult in Sung China”,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No. 2, 1979, p. 132.

③ 关于《下部赞》的年代考证，见虞万里《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 卷，1995 年，第 37—46 页。

尼”一词，指代教主的是“忙你”。另虽有“五等光明佛”（第129行）、“五大光明佛”（第236、244行）之谓，但并无序列式“五佛”之称。因此，诸如“五佛摩尼光”、“末号摩尼光”的提法，不可能始于唐代，而应是华化成明教之后。考北宋解禁《老子化胡经》，编入官方《道藏》，这就意味着其老子化摩尼之说为朝廷所接受，而明教以摩尼为教主，也就成了道教之一宗。^①因此，摩尼已不再等同“邪见”，而是老子所化。是以，现存涉及宋代明教的文献，盖未提及或暗示明教徒有称教主为“忙你”者。而到了元明时期，明教徒把教主通称为摩尼佛、摩尼光佛，更得到诸多文献和碑石资料的证明，毋庸置疑，不赘。^②因此，在宋代及其尔后流传的《下部赞》抄本，不可能采用“忙你”的字眼，科册所据《下部赞》无疑并非唐代古本。既非唐版，又是个全抄本，当非出自教外人士之手，应是明教会所认可者，故其权威性自毋庸置疑。

陈摩本所据《下部赞》抄本既出自明教会，那么其所录文字如与敦煌本有实质性差异，在排除出于唐代不同版本和明教会修改的可能性后，问题自出在科仪本制作者本身，或误录，或误改，或刻意修改。下面试行辨释。

四、霞浦本出于不谙教理之笔误

霞浦本与敦煌本之差异，有些显为前者因不谙教理的笔误。例见第三组即《下部赞》第42行前两句“大圣自是吉祥时，普曜我等诸明性。”在这一组里，霞浦三个科册都将次句的“明性”写成“明使”。

把敦煌本的“明性”，写成明使，一字之差，貌似粗心笔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科册制作者不明原诗真谛。敦煌本的明性，从语境看，指的是信徒的灵魂，信徒的心，该句用现代汉语，可解读为祈祷明神以光明照亮吾等信徒的心。而“明使”，本来就属于明界之神，焉还得祈祷明神照耀他们。因此，明白教理的信徒不可能把“明性”误为“明使”。假如此一错误出在所依据之母本上，其教中人在反复诵念时当会发现，并早已改之。惟有那些不谙教理的人才会产生这一笔误后，一直不知错而不改。

另例见第五组的录文，是为《下部赞》第127行“又启日月光明宫，三世诸佛安置处，七及十二大船（船）主，并余一切光明众。”陈摩本将第三句的“船”写成“般”。此处的“船”，在摩尼教义中乃喻运送善子回归光明王国的载体，而“船主”，则指拯救善子之明神。“船”和“般”尽管字形相近，但在摩尼教义中，船有着重要的内涵，明教徒绝不可能把“船主”误作“般主”。顾陈摩本的“船”写作“ ”，见第182行（科册页23）“运大明（船）于彼（岸）”，360行（页45）“大圣每将解脱 ”，442行（页56）“广遊苦海驾明 ”，522行（页65）“向生死海驾明 ”；又写为“舡”，见583—584行（页73）“愿离恶党致明舡（船）”。而“般”则作“ ”，除343行（页43）的“七级十二大主”外，尚见078行（页10）“香烟涌出百万（般）”（并见478行，页60），084行（页10）“悞深甚若”，439行（页55）“十殊胜永清新”；还有一处作“ ”，见601行（页75）“八（般）无畏表神威”。由是，可见科册抄写者在“船”和“般”的书写上分别清楚，未见含糊，以至两者可能被他人混淆。初始有误，不足为奇，但科册乃用于法事仪式，反复颂唱，假如科册的制作者及其承传者明白经文意思，断不难发现这一硬伤而予以修正。

① 详参拙文《“宋摩尼依托道教”考论》，张荣芳、戴治国主编《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81—107页。

② 详参拙文《福建明教十六字偈考释》，《文史》2004年第1辑，第230—246页；复见拙著《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98—224页。

类似这样不谙教理的笔误复见于第十二组，其间敦煌本 413 行的“七施十戒”被写成“七世十戒”。“施”和“世”同音，自可用笔误解释；但敦煌本《下部赞》两度出现“七施”，除本处外，另一见于 387—400 行的《听者忏悔愿文》，其间要听者忏悔“有缺七施十戒、三印法门”（391—392 行）。至于“七世”，不仅《下部赞》未见，其它摩尼教经典也未见该术语。从语境看，“七施十戒”显指摩尼教信徒应遵守的善行和教规。其“十戒”，见于异域摩尼教文献的忏悔文，即要信徒遵守十诫，即不拜偶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行邪道巫术、不二见（怀疑）、不惰，每日四时（或七时）祈祷。^①而“七施”，其具体内容未见现存的汉文摩尼教文献，未有明确的记载；但施者，惠也，与也。就宗教意蕴而言，“七施”当谓七种惠与他人之善行。至于具体哪七种，如今虽不清楚，但于古代摩尼教徒、明教徒来说，应属教理初阶。假如陈摩本的编撰者及其传人与明教确有承传关系，不至于不解其意而笔误且误而不改。

五、霞浦本不谙教理之误改

霞浦本在采录《下部赞》时，不仅有不谙教理而产生的笔误，还有因不谙教理而自作聪明的擅改。例一同见上揭第五组，其将敦煌本 127 行首句的“光明宫”，改为“光明佛”。乍看未尝不可，但结合次句，即可识其误；缘日月作为宫殿始能安置三世诸佛。这固然是于诗句理解有差所致，实际则自曝科册制作者于摩尼教理无知，不晓日月宫于拯救善子过程中之作用。

另例见第八组，即敦煌本第 169—172 行，其在原写卷中，题为“收食单 大明使释”，乃完整一诗偈，以十二位明神之名号称扬各种美德，敦煌本除“一者无上光明王”和“九者直意虚舍那”外，其他十位均缀以“佛”字。霞浦版则统称为佛。在敦煌本中，该偈本来是对应其上面另一偈“一者明尊 那罗延佛作”（第 164 行）：

- 165 一者明尊，二者智慧，三者常生胜，四者欢喜，五者勤修，六者真实，
166 七者信心，八者忍辱，九者直意，十者功德，十一者齐心和合，
167 十二者内外俱明，壮严智慧，具足如日，名十二时，圆满功德。

在敦煌本中“光明王”仅见于此一处，称之为“王”，冠以“无上”，列其为“一者”，其实就是对应上偈的“明尊”，指光明王国最高神。其不称佛，而称“王”，称“明尊”，显然就是要区别于其它明神，缘其它明神概可称为光明佛。敦煌《下部赞》第 025 行就有“日月光明佛。”，另外第 129 行有“五等光明佛”，第 244 行有“五大光明佛”。因此，可以断言，敦煌本《下部赞》作“一者无上光明王”，并无笔误，道明原作就是如此。把“光明王”改称“光明佛”，亦不可能是源于陈摩本所依据的明教本。缘明教徒抄写整部赞诗时，当然明白其间光明王与光明佛之有别，不会擅改。倒是科册的制作者采录时不明就里，为求称谓的统一而将王擅改为佛。

六、霞浦本之刻意修改

霞浦本与敦煌本的差异，固然有制作者不谙教理造成的错误，还有与教理无涉者，只是为因应法事场合而刻意加以变通修改。例一见第一组，即敦煌本第 11 行“是故澄心礼称赞，除诸乱意真实言。承前不觉造诸愆，今时恳忏罪销灭。”该诗在《下部赞》中，本属题为“□□□览赞夷数文”的一颂。从题目看已可判断是用于例行的礼拜场合。而在陈摩本科册中，是用于夜

^① Jes P. Asmussen, *X^u āstvēnī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 第五章 “The Confession of Sins among the Manichaeans”, Copenhagen, 1965, pp. 167–261.

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馀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姐等人，建设道场，鼓煽愚民男女，夜聚晓散。

此处但称明教之人“建立屋宇，号为斋堂”，还把彼等之建斋堂定性为“私建无名额佛堂”，但没有点明其有结坛行为。而密日聚会，建设道场，不过是常规礼拜；至于“夜聚晓散”，无非是朝拜日、夕拜月的礼俗。该等毕竟均属常例宗教活动，与为特定功利目的而举行之斋醮仪式自应有别。因此，从官方文献这些措辞看，至少暗示即便南宋明教有斋醮活动，也不像道教那样地道普遍，以至官员未予直指。

像《下部赞》这样的赞诗，从其名称和内容看，属于宗教赞诗的选编，主要面向下层信徒即听者，供他们所传修，并因应日常和节日诸宗教仪式选用颂唱。^①而道坛斋醮，是各有特定的目的，或请福，或荐亡等等。是以，宋明时代的明教徒即便也有设坛斋醮之俗，在各种具体的斋醮科仪中，虽可像陈摩本科册那样，参考撷取其部份内容，然将全卷照搬或改造作为某一特定斋醮的科仪本，则殆无可能。因此，诸如“洒除坛界”、“严洁净口”这样的道坛斋醮术语，不会是出自陈摩本所依据的母本上，而应出自科册制作者之刻意修改。

七、余 论

本文涉及的三个霞浦科册，均有《下部赞》诗文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撰作者都有缘接触《下部赞》抄本。所比十二组诗文，陈摩本不但均有，而且有的还反复出现，足见该科册原始制作者曾把《下部赞》作为重要参考资料。至于其它两个科册所见《下部赞》诗文，不惟未超过陈摩本已有的内容，而且少得多。其中，陈兴本仅见《下部赞》第30行（第二组）、第42行（第三组）和第206行（第九组）三处；谢点本则惟见《下部赞》第42行（第三组）、第206行（第九组）两处。不过，后两个科册均不如第一个完整，是以，自不能因彼等只有两三处就断言其未接触过全抄本。但陈摩本既是全卷式地选录《下部赞》，那么，其它两个文本即便其佚失的部份还有《下部赞》诗文，未必就刚好包括了上揭陈摩本所录的其它9处，以至可供陈摩本袭用。因此，最有可能接触《下部赞》全抄本者，应数陈摩本。至于陈兴本和谢点本有关诗句是否亦直接录自《下部赞》抄本，则未必。缘从上面十二个比较组看，霞浦三个版本与敦煌本的一些差异，存在着共同性；尤其是上面所举第三比较组，霞浦本均把“普曜我等诸明性”的“明性”都误作“明使”，尤为典型。故窃疑原错出陈摩本，而其它两个文本则以讹传讹耳。假如这一推测不谬的话，则单从采录《下部赞》诗文这一点，便可推断陈摩本科册版的制作要比其它两个科册为早，成为后两者编撰的参考物。亦正因为如此，霞浦三个版本与敦煌本之比较始见多有共同的差异。这也就提示吾辈，田野调查所发现的有关科仪本，未必是同一时期的批量产物，彼等之形成或有先有后，若后者参考前者，亦属常理。

学界或把霞浦科仪本直当北宋明教遗书，本文考察上揭抄本中采录《下部赞》诗文之异同，辨析其差异产生之诸多原因，庶几有助于澄清有关之认识。

（责任编辑：于光）

① Cf. Lin Wushu, "A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of Chinese Manichaean Hymnal", in A. van Tongerloo (ed.), *The Manichaean NOYΣ*,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rganized in Louvain from 31 July To August 1991*, Lovanii 1995, pp. 177-181. "Notes on the Title of the Dunhuang Manichaean Hymnscroll (S. 2659 摩尼教下部赞 Mo-ni chiao hsia-pu tsan)", A. van Tongerloo (ed.), *Il Manicheismo Nuove Prospettive Della Ricerca*, Brepols 2005, pp. 255-262.